

大历诗人研究



蒋寅 著

DALISHIREN YANJIU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閔麟



大历诗人研究

蒋寅 著

DAL SHIHEN YANJIU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历诗人研究/蒋寅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301-11700-2

I. 大… II. 蒋… III. ①诗人—人物研究—中国—唐代②唐诗—
文学研究 IV. K825.6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927 号

书 名: 大历诗人研究

著作责任者: 蒋 寅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700-2/I·08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46.25 印张 622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导 论

本书是我已出版的论著《大历诗风》的姊妹篇,是关于大历时期诗歌创作活动与诗人群体的历史研究。

1986年,当我以大历诗歌研究为题构思我的博士论文时,曾计划写成内外两篇:内篇着眼于横向的剖析,从各个不同的层次综观大历诗的精神风貌和艺术特征;外篇立足于纵向的考察,从平面的描述上升到立体的复原,并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它的实态。由于时间的关系,结果只写成了18万字的内篇,以《大历诗风》为题申请学位。答辩委员在肯定其共时性研究之新颖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缺乏历时性研究带来的单薄之处。现在我写这本书,既是弥补《诗风》的不足,也是完成预定的计划。

本书的范围仍以《大历诗风》所确定的由至德元年(756)到贞元八年(792)的36年为限。在本书中,我将面对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分析他们的创作和作品,探索他们的相互关系和诗风的异同,由此逐步描绘出大历诗坛的全景,并得出一些有关这段诗歌史的基本结论。这些结论会与《大历诗风》的结论互相发明,互相补充。

在《大历诗风》的末章,我曾将大历诗风的内涵概括为这样几点:

在诗歌的体式方面,大历诗人较重视近体,较重视五言,总的来说,他们古体的成就不如近体,七言的成就不如五言,长篇的成就不如短章。他们写得最好的是五律,其次是七律、五绝,七绝也有些出色的作品,乐府和古体诗较一般。

在审美趣味上,由崇尚汉魏风骨转向追慕以谢朓为代表的六

朝清丽纤秀之风,由阳刚之美转向阴柔之美,由健朗的气骨转向悠远的韵致,由豪迈的气势转向幽隽的情调,由雄浑凝重的格调转向清空闲雅的意趣。

在创作方法上,由瑰丽的浪漫主义转向朴实的现实主义,注重写实,擅长白描,工于形似之言,写情细腻深刻,写景生动逼真,言情体物均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气象不够恢宏,边幅稍嫌狭窄。

在主题取向上,由偏重于表现理想转向偏重于表现感受,由社会生活转向伦常情感、身边琐事,感遇咏怀之作减少而酬赠送别之作激增。作品中主要吟咏迷惘的心态、衰老的感受、孤独的心境、乡愁羁恨以及山水之趣,其中贯穿着对友情的渴望,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在作品构成上,由物我对峙达成物我同一,主要通过移情手法来表现主观感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象具有具体性和静态性的特点,意象结构主要是平列式;作品的语言追求清新的风格,甚为炼饰,乃至雕琢,但句式圆活,意思明快,很少用典,显出明晰流利之美。

这是大历时期诗歌创作平面地展现的总体风貌,生活在大历时代的诗人,不用说都会体现出这些特征的一部分乃至全部。将它们一一加以指出,我想是不太困难的。但这么做毫无意义,只能重复既有的结论。文学创作的成功在于个性,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就在于揭示个性因素,而差异正在于比较之中。我希望通过比较发现大历诗人们的个性特征,使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平面的板块,而是作为一个立体的群像树立在我们面前。为此,我的叙述将略于《诗风》概括的共同点而着重分析他们各自的特点。

大历是个特殊的时代,处在开天与元和两个伟大时代之间,既没有涌现一流的伟大诗人,也未产生许多惊心动魄的杰作,像是两大高峰之间的波谷,历来就不太为人注目,研究得也较少。但这决不表明它不重要,更不意味着易于研究。从某个角度来说,它甚至比其他时代的诗歌

更让人感到难以着手。因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大都身历数朝——生长在开天盛世,青少年时期在唐朝鼎盛的年月度过,在安史之乱中进入中年,到大历年间稍近晚岁。较长者如钱起、刘长卿,到大历元年(766)已四十出头,年少者如李益也近弱冠。安史之乱明显把他们的生活境遇和人生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个时代给他们的感受差别是那么大,以致当大乱初平,他们痛定思痛,蓦然感到自己的衰老,都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痛苦的经历和伤感的心境,使他们乱后所作的诗与其开天时期的作品截然异趣。时代的差异要求我们在进行诗人群体、风格的比较时,还要同时注意个人诗风的转变。尽管我们对大历诗风的总体转变已略为清楚,但一具体到个人,在传记资料缺乏、作品系年困难的情况下,这仍是很艰难的任务。吴乔早就指出:“诗乃一念所得,于一念中,唐宋体有相参处,何况初盛中晚而能必无相似耶?”^①连不同时代的作品都可能出现体格上的相似,一个人不同时期的作品就更不用说了。我只能尽可能地力求取材的审慎,避免指鹿为马,无的放矢。为了给下文的流派和作家研究提供一个适当的参照,我想先在此对大历、贞元时期的历史状况和诗史进程作个简单的分析。

一、十年多难

我们要讨论的虽是大历时期的诗歌,但进入问题却必须从玄宗天宝后期开始。让我们把眼光投向天宝十一年(752),看看这个平安却并不平静的年头发生的几件事:首先是宰相李林甫在十一月病死,杨国忠取代其位。李林甫谄媚邀宠,嫉贤妒能,是有名的口蜜腹剑的阴险小人,一命呜呼,朝野称快。可杨国忠不学无术,骄横跋扈,也不是善良之辈,他继林甫秉政,堪称虎去狼来。十二月,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去年二月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遂领平卢、范阳、河

^① 《围炉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第5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东三镇，有兵二十余万，今合史思明所掌，几据天下兵力之半。见玄宗年事已高且耽于声色，国内府兵制瓦解，武备松弛，不免潜蓄异志，有中原逐鹿之心。为此，安禄山招贤养士，募可用之人，以备驱遣。杜甫《后出塞》记其事道：“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王嗣爽说：“召赴蓟门者，禄山也；势已盛而逆未露，且以重赏要士，故壮士喜功者，乐于从之。”（《杜诗详注》卷四）由此可以想见，安禄山的召募曾使天下之士翕然景从。大诗人李白也许就是因此在天宝十一年游幽州的，他于十一月抵达范阳，作有《行行且游猎篇》、《出自蓟北门行》、《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等诗，抒发“怀恩欲报主”的豪情。但没多久，他就因看到边地战争的真相而情绪激愤；同时他目睹安禄山的跋扈之状，内心也产生一丝隐忧，后来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曾写到：“十月到幽州，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杜甫在《后出塞》里也写到“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的情形。的确，这时的安禄山气焰已嚣，反在必行，人们只是慑于威势，噤口不敢议论而已。

玄宗对禄山宠遇日隆，禄山“势已盛而逆未露”，所以国家表面上还是四海升平。但危机正在平静中酝酿，敏感的仁人志士从这场风暴将临之前的沉闷和压抑中已感受到了天下大乱的迫近。天宝十三年（754）秋，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登慈恩寺塔，面对四望秦山、千里神州，忽然感到一种难言的忧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这充满仓皇不安之感的景物描写怎么也像是寓有某种象征意义，钱谦益说“岌岌乎有漂摇崩陷之惧”，并不让人觉得穿凿。诗人预感到大乱将兴，眼前仿佛出现战乱流离、哀鸿遍野的悲惨情景。事实上没过多久他就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并饱受其苦。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大阅誓众，发所部兵及同

罗、契丹、室韦各部凡十五万众，号称二十万。出范阳，下太原，一路披靡。十二月连陷陈留、荥阳、洛阳等地，一个月内即占领今河北、山西、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时海内承平日久，府兵颓废，叛军所至，州县望风瓦解。君臣上下仓皇失措，一时竟无人能镇静应敌。年底，哥舒翰守潼关，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在振武破敌，颜真卿兄弟策动河北诸郡起兵讨贼，这才稍振群情，奋力抗敌。随着翌年六月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奔蜀，肃宗即位灵武，唐与安史乱兵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艰苦战争。尽管一年后就收复长安，二帝还京，安史又自相残杀，但形势始终未轻松。九节度兵败河阳，东都得而复失，李晟败绩北邙山，都曾使局面变得危急。除了淮河以北的中原平叛战争之外，南方还有永王东巡、刘展乱江淮、康楚元据襄州、段子璋陷绵州、徐知道反成都及浙东袁晁农民起义等规模不一的战争，西北党项、吐蕃也乘机入侵，掠夺边州。环顾四海，兵戎无定，哀鸿盈野，生灵涂炭。“烽火有时惊暂定，甲兵无处可安居。”^①这就是当时战乱现实的真实写照！

经过八年的挣扎，朝廷方于广德元年(763)平定叛乱，在风雨飘摇中度过这场浩劫。然而这时整个国家已是百孔千疮，惨不忍睹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昔日的繁华早已如烟消花落，山河虽在，无复旧貌；城池荒圯，满目榛芜。看看当时映入人们眼中的凋敝景象吧：历来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東西两京“官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并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郭子仪传》)。河北是“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5. 1492)；江南是“吴越征徭非旧日，秣陵凋敝不宜秋”(李嘉祐《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书相问因以赠之时七夕》，6. 2164)；浙东是“空城垂故柳，旧业废春苗”(刘长卿《送朱山人放

① 郎士元《赠韦司直》(8. 2784)。本书引唐诗，凡据中华书局二十五册排印本者，标注方式为：册·页数。

越州贼退后归山阴别业》，5. 1489）。中原板荡，“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张继《送邹判官往陈留》，8. 2720），朝廷的军费开支全落到南方农村，“犏越而衣，漕吴而食”（《通典》十“食货”），过度的征括使南方农民不堪其劳，以至袁晁农民起义时“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通鉴》宝应元年）。农村经济凋敝，导致国家财政的窘迫状况。军队要粮饷，灾民要赈济，功臣需赏赐，可国库却是“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张继《酬李书记校书越城秋夜见赠》，8. 2721）！难以想象当时人们是怎么度过那极度匮乏的时期的。而诗人们，像李白那样到处被奉为上宾、酒肉不缺的幸运者，显然是并不多的。杜甫便没那份福气。安史之乱前夕他由京师返奉先家中时，幼子已饿死。在日后的流离途中，他常常只能以野果充饥，彭衙孙宰的一顿晚餐，竟博得诗人“高义薄层云”（《彭衙行》）的赞美，可见当时的生活已艰难到何等地步！八年战乱让人们备尝人间苦难，“十年多难不还乡”既成为铭刻在人们心头、永不可磨灭的记忆，同时仍然是现实的生存危机。它使一向乐观、轻快、单纯的唐诗经受苦难的洗礼，充满叹息和泪水，变得沉重而忧伤。

其实，现实的生存危机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生存危机可以激发人的自强精神，而危机一旦过去，人们也会感到解脱的轻松。可怕的是信念的沦丧。对前途的信念的危机，是不会轻易随局面的好转而解脱的。它会深深沉积在心理底层，化为一种心境渗透在整个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中。经过安史之乱，昔日威加率土、四夷来宾的大唐帝国已到了举步维艰、危机四伏的境地，每一个能正视现实的人都不能不对王朝的命运产生怀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忧虑。开天盛世过来的老诗人，在升平岁月度过数十年光阴，那由空前的繁荣强盛熏陶出的坚强的信念、浪漫的气质流动在他们的血液中，足以使他们在任何紧急危亡的关头，心中都存有一个辉煌的大唐梦。李白在去世前不久还打算投李光弼帐下效力；杜甫在胡焰正炽、国势可危之际，仍昂然朗咏“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这与其说是对形势的正确估计，还不如说是由盛世的深刻印象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必胜

信念。“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他们对此是确信无疑的。这种信念不是基于理性分析，而是基于主观意志。尽管杜甫是个人世很深的人，但在这一点上却仍显出十分天真单纯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色彩。相比之下，在战乱中度过青春进入中年的较年轻的一辈就没这么简单了。他们没有那么牢固的信念，战乱给他们的印象与感受远较盛世为强烈和深刻，因此他们的心理要复杂得多，态度要现实得多，眼光也要客观得多，从而也就悲观失望得多。钱起正好与杜甫形成一个对照。他的《广德初銮驾出关后登高愁望二首》（7. 2610）作于广德元年（763）吐蕃入侵、代宗狩凤翔时：“汉帜远成霞，胡马来如蚁。不知涿鹿战，早晚蚩尤死？渴日候河清，沉忧催暮齿。”诗人觉得这场战争的终结遥遥无期，对垂老的自己像渴者期望河清一样难以等待，浓重的失望和低沉的情绪笼罩全诗，使第二首末尾“周德更休明，天衢伫开泰”的自慰显得有气无力，似乎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此诗与杜甫《北征》相去八年，正好是安史之乱的岁月；钱起只比杜甫小十余岁，但从心理上看俨然是两代人了。

由于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他们再也激发不起蓬勃的热情、豪迈的气概。积极进取和乐观自信的态度也随之丧失，热切的干世欲望转为消极隐遁之思。这种时代精神的变化，鲜明地反映在诗歌中：“交融成盛唐之音的观念、气魄、情调全都黯淡了、褪色了、低沉了，为一种疲倦、衰顿、苍老而又冷淡的风貌所取代。”（《大历诗风》第22页）当时人习惯将天宝十四年后的十年看作一个历史阶段，诗中每有“十年多难”的说法^①，这“十年多难”在大历贞元时期乃至整个唐代后期的士人心理上都留下了一块阴影，以致人们总是不时地回顾这段历史，发出各种各样的感慨！而这十年的诗歌创作，就成了大历诗歌的前奏。

由于作家队伍的年龄划分，由于战乱给人带来的同样深重的苦难，这一时期的创作大概可分为开天遗留的老诗人和年轻一辈新诗人两大

① 参看《大历诗风》第64页。

阵营。无论李杜高岑王维,还是元结及《篋中集》诗人,都在继续发展他们的诗风,在旧有的雄劲豪迈中添上一抹悲壮凄凉的色调;而大历诗人则不仅后分为三派的群体特征尚未形成,总体的范式和风格也未形成,正处在初步的变异阶段。可以说,作为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始的新老两代诗人正处在接力区内,在他们之间更多地显示出重合和趋同的倾向。

二、空虚和感伤的年代

满目烽烟,一身飘零,辗转沟壑,离去乡里,战乱让人们经受了说不尽的苦难。宝应元年(762)十一月,当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请降、天下悉平时,那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李白没能活到这个时刻,否则不知要写出何等狂喜的快诗来!而杜甫则一反谦谦谨重的常态,挥洒出平生第一首快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翘首已久的胜利终于到来,怎不叫人欣喜若狂,潸然进泪呢!

然而,当胜利的喜悦稍稍平静,人们逐渐冷静下来,就立刻发现,他们的处境并未得到多少改善,各方面的情形都糟透了。安史叛乱虽已平定,可是外患却在加剧。乱起后,吐蕃趁国内用兵,边庭空虚,连年入寇,兵锋直逼近畿州县。广德元年入大震关,尽占陇右之地,后又不断蚕食西北边州,对唐朝构成极大的威胁,代宗一朝疲于防范。同时,内乱也未停息,史朝义部将降唐后依旧占据河北一带,朝廷值“多事之后,姑欲安人”(《旧唐书·薛嵩传》),既无心思也无实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只能任其盘结自固。《旧唐书·德宗纪》载:“大历中,李宝臣、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等,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盗完城缮甲,略无宁日。”到大历十年(775),田承嗣便蠢蠢而动,公开与朝廷对抗了。在这之前,还有永泰元年(765)七月淄青副将李怀玉逐其帅

侯希逸,朝廷只得授以节度留后;同年闰十月检校西山兵马使崔旰杀剑南节度使郭英义,朝廷派杜鸿渐镇西川,杜请授崔西川防御史的事。朝廷的姑息助长了宵小的觊觎之心,乱臣贼子蜂起:大历元年(766),前虢州刺史庞充据华州;三年(768),泸州刺史杨子琳袭据成都,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节度使李怀仙;五年(770)湖南兵马使臧介杀观察使崔瓘;八年(773),哥舒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十年(775),昭义牙将裴志清逐其帅薛萼;十一年(776),李灵曜据汴州乱。直到十四年(779)三月李希烈逐李忠臣,占据淮西,终代宗之朝,可以说是叛乱不绝。

频繁的战事,巨额的军费开支,使方经重创、元气未复的唐朝财政更为窘迫,百姓更加贫困不堪。每逢虫害天灾,谷物踊贵,斗米动辄至千文。永泰元年秋旱,斗米至千四百文。就这样,朝廷还想尽办法搜刮钱赋。先是从第五琦之奏,恢复古代什一之税(十亩税一亩);接着又税百官钱,市绢十万赏回纥,继而纳百官职田助军费;大历元年税天下青苗地钱得四百九十万贯,充百官俸钱;二年(767)十月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助军粮,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钱助军;四年(769)正月敕有司定天下士庶每户税钱分上中下三等;九年(774)按诸道防秋兵马人数征和余钱。其增税之频真令人吃惊!

代宗是个平庸无能的君主。他在永泰元年元日的诏书中虽也曾表示“率是黎元,归于仁寿”、“大振纲维,益明惩劝”(《旧唐书·代宗纪》)的决心,但他在位的年代,政治却是最昏暗的。军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先是李辅国、程元振,后来是鱼朝恩,权倾朝野,威势无比;政权则掌握在一帮奸臣手中:宝应元年六月,即位不久便任命元载为相,两年后又以王缙、杜鸿渐同平章事。元载为人阴险贪婪,王缙懦弱,杜鸿渐圆滑,三人沆瀣一气,把持朝政,不附己者必加排斥。宦官奸臣当道,使君臣隔阂,上下猜忌。连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元勋都心怀疑惧,何况他人?李怀让被程元振陷害自杀,功臣来瑱遭谗赐死,仆固怀恩被猜忌逼反投于吐蕃,秘书监李揆巧食江湖,颜真卿贬峡州员外别驾……元载三人又同佞佛,《旧唐书·王缙传》载:

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载、杜鸿渐与缙喜饭僧徒。代宗尝问以福业报应事，载等因而启奏，代宗由是奉之过当，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经行念诵，谓之内道场。其饮膳之厚，穷极珍异，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廩给。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苟幸其退，则横加锡赐。……又见缙等施财立寺，穷极瑰丽，每对扬启沃，必以业果为证。以为国家庆祚灵长，皆福报所资，业力已定，虽小有患难，不足道也。故禄山、思明毒乱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将乱而死；西戎犯阙，未击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征也。帝信之愈甚。

有君臣如此，国家焉能平安？内忧外患交并，君主又显示不出整顿天下的才具和魄力，于是现实给人的只有失望。正像千帆先生所说的，“那是一个从恶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①。对刚从大乱中挣扎过来的人来说，记忆犹新的战乱岁月如一场恶梦，幡然醒觉，一切依然，不知梦耶非耶，是真是幻。所以当时人心头都浮漫着一层迷惘恍惚的色彩。

剧烈的沧桑变故促使人对历史进行反省并重新审视自我的存在，理想的幻灭和现实的残缺给人带来极度的空虚、失望和感伤，为了摆脱这精神上的苦恼，他们向宗教寻求精神逃避和寄托的净土，同时也在世俗生活的享乐中求得慰藉和补偿。前者表现为对佛教尤其是禅宗和天台宗的热衷，后者则在对“吏隐”生活的追求中显现出来。^② 大历时期的人总体上显示出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个人安逸的苟安心理。这不奇怪，大历本来就是个苟安的时代，君主无所作为，士人也无心用世。

在大乱中，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的。世难不靖，个人无法摆脱流离颠沛的境遇。而一旦天下平定，人们就再也不管那与自己无关的事了。他们希望忘掉那噩梦般令人心有余悸的岁月，追回逝

① 《唐诗鉴赏辞典》前言，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参看《大历诗风》第四章中“隐逸的旋律”一节。

去的青春,补偿失去的天伦之乐,生活态度由盛唐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平凡、世俗的人伦情感和家庭生活乐趣。这反映在诗中,就是千帆先生说的“着眼用力于写日常生活,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贯串于悯乱哀时的情绪之中,便形成大历诗歌的基调”(《唐诗鉴赏辞典》前言)。所谓“大历体”,在这阶段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这时,开天盛世留下的老诗人逐渐去世,到大历七年(772)元结亡故,复古诗派亦已消失,诗坛上活跃的作家由于生活经验的差异,分流为地方官诗人、台阁诗人、方外诗人三个群体。在前一时期,大家都一样面对战争问题或在战争中流离;而此刻中原战事稍弭,政治局势由全国战乱向地区性战乱转变,诗人们因生活在不同地域、面对不同的生活环境,诗歌处理的内容、处理的方式以及诗歌的功能,就出现了分化。地方官诗风、台阁诗风、方外诗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自发展,形成鼎足三分之势。其中台阁诗人在大历初入朝,朋比游从,因适应了战乱甫平的苟安心理氛围和送往迎来的交际需要,在当时格外有影响,后来论大历体也总是以这批诗人为代表。

三、中兴好梦

经过肃、代两朝的喘息复苏,尽管社会生活还总是这样那样地不如意,但时局终究安定了许多。从肃宗朝到德宗朝,社会基本上是由动乱走向苟安,而德宗的即位也确给人们带来中兴的好梦。与肃、代二帝不同,德宗是个颇思有为的君主。他一登基就施行一系列值得称道的善政,如罢邕府岁贡奴婢、剑南岁贡春酒,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放文单国所献舞象及五坊鹰犬,停梨园伎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出宫女百余人,诛暴臣兵部侍郎黎幹、宦官刘忠翼。加上以刘晏总领天下财赋,加郭子仪尚父号,行久旷的太尉礼等,不到一月政举令行,中外皆悦。接着,又罢诸道岁贡若干种及不合时宜的奢侈用度,罢天下榷酒,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同时,在杨炎倡导下,德宗在建中元年(780)正

月还颁布了新的赋税制——两税法，“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人，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旧唐书·杨炎传》）。这对乱后农村凋敝，人民逃亡的现实状况来说，不失为一项保证朝廷税收、杜绝“公托进献、私为赃盗”（《旧唐书·杨炎传》）之弊，使贫困之户稍得舒缓的有效措施。如此一系列开明举措，尤其是大历十四年五月为郭子仪行册太尉礼、建中元年十一月于宣政殿见朝集使及贡使，恢复了自天宝以来久废的常礼，显出一种政修礼复的中兴气象。不久，太常卿韦伦使吐蕃回，吐蕃宰相论钦明思随来修好，西北边境暂时平静。内复旧礼，外息边患，二十多年来人们何尝一日见过这种光景？又何尝一日不梦想着这种光景？如今一旦出现在眼前，朝野上下，谁不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

然而没过多久，人们的中兴好梦就被无情的事实所打破。首先是建中元年二月德宗听杨炎谗，贬刘晏忠州刺史，七月复赐自尽，在人们的中兴幻觉中投下了一片阴影。当时刘晏的亲故属吏多罹贬谪，“党议连诛不可闻，直臣高士去纷纷”（戴叔伦《敬酬陆山人》，9.3105），朝内弥漫着一股恐怖的气氛。二年（781）二月，卢杞为相。此人忌刻阴邪，知德宗察察多猜忌，每曲意希旨，排斥异己，致功臣疑惧不安。在此同时，河北藩镇开始蠢动起来。大历十年田承嗣就攻占相卫所管四州，自署长吏。而朝廷一味姑息，加爵位笼络，诸镇益发肆无忌惮。朝廷欲加防范，便合纵而叛。自建中二年起，朝廷先后与梁崇义、田悦、李纳、李惟岳、朱滔、王武俊、李希烈作战。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朝廷难以支持，于是在二年五月又恢复什一而税，三年（782）正月减百官俸钱三分之一助军，四月诏索京畿富商，五月复于两税钱每贯增二百、盐榷钱每斗增一百，九月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二十文。建中四年（783）六月，还税屋间架、除陌钱……当时“凡诸道之军出境，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判度支赵赞巧法聚敛，终不能给”（《旧唐书·德宗纪》）。德宗却不顾这些，一心只要讨伐自称太尉、建兴王的叛臣李希烈。结果他没料到，危及唐运的并不是李希烈等割据藩镇，却是内部

的兵变。

建中四年冬，增援河南哥舒曜的泾原兵因伙食太坏在长安哗变，德宗狼狈逃往奉天。叛军迎朱泚为帅，围攻奉天甚紧，城中衣食窘乏，形势危急。值此人心向背之际，陆贄劝德宗下罪己诏，历数自己“暗于经国之务……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的失责，对天下“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旧唐书·德宗纪》）深表悲悯，朝野这才陡增同仇敌忾之心，终于在五个月后平定叛乱，两年内又平定李怀光、李希烈之乱。天下兵戈，由是而息。

可是困境并未就此摆脱。连年饥馑相因，岁凶谷贵，衣冠窘乏，朝野一时还不能改变积贫积弱、萎靡不振的状态。德宗经播迁之难、衣食之窘，不是开诚布公，任贤进能，却拼命聚敛钱财入内府。又猜忌功臣、太子，幸有李泌左右弥缝，才避免昔日仆固怀恩、建宁王之冤。而两税法却终究信誉扫地了。贞元三年（787）十二月，德宗畋于新店，人民赵光奇家，因当年丰稔，问百姓乐否，对曰不乐。询其故，答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通鉴》卷二三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横征暴敛和百姓负担之沉重。但不管怎么说，经李泌与德宗君臣相约及陆贄的攘外安内，值大乱之后，上下务休致升平。贞元四年（788）春，虽地震频仍，德宗还是在三月甲寅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德宗赋诗一首，群臣属和。九月丙午又诏曰：“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九日，赐百僚宴于曲江亭，作《重阳赐宴诗》六韵，群臣毕和，德宗自评其优劣，以刘太真、李纾为上等，鲍防、于邵为次等，张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旧唐书·德宗纪》）。翌年二月改晦日为中和节，赋诗遣使颁赐天下。六年（790）春二月朔，百僚会宴于曲江。

亭,德宗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三月三日,百僚复宴,德宗赋《上巳诗》一篇赐之;七年(791)制于五月朔御宣政殿朝百官,七月幸章敬寺,德宗赋诗九韵,太子与群臣毕和,题于寺壁;九年(793)春正月朔朝贺毕,德宗又赋《退朝观仗归营诗》。这样的君臣同乐的确能造成一种小康景象,并掀起一股台阁诗风。惜乎此时诗人都不在朝中,“十才子”已零落殆尽,仅包佶、刘太真、李纾等几个以文章出名的文士维持台阁风雅,所以台阁体终究未造成声势。同时,人们似乎也不再做梦了——奉天之难把人们一点中兴的热情又泼灭了——都在趁太平抓紧享乐。

贞元九年二月城盐州,自是边患息;八月一代重臣李晟薨,标志着德宗前期战乱时代的结束,正像郭子仪之薨标志着大历时代的终结一样,此后天下渐次太平。当然,就文学时代的分期而言,我以为贞元八年作为大历时代的结束更为合适。因为在这一年,大历时代的几位文坛盟主包佶、李纾、刘太真相继去世,同时以权德舆为首的一批幕府文士登朝,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成为大历台阁诗风的继踵者和元和诗人的提携者。从德宗登基到贞元八年的这十三年,是大历诗歌由高潮转向低潮的时期。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台阁诗人,因长期沉迹下僚,锐气销尽;兼之到建中末贞元初前后,诸子死的死,贬的贬,无复昔日联袂游从之盛,其风尘苦语渐与地方官诗人合流。而地方官诗人也年事日高,逐渐凋零,除戴叔伦、戎昱二三子还保持着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外,其余大部分诗人都心灰意懒,日趋闲放。建中初江西道一的马祖禅流行一时,曾给禅林带来任心直行的狂荡作风。风气所及,坦荡写意的诗风也成为建中贞元后诗歌的倾向性特征。这在方外诗人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地方官诗人也渐向方外诗人靠拢。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方外诗人的诗风占主导地位之时,到贞元后期,诗坛就形成了方外诗人与权德舆等新台阁诗人二分天下的局面。至于贞元九年以后登上诗坛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要到贞元后期才产生影响。这一代人虽育于乱中,但在渐次太平的建中贞元年间长成,他们的心理素质终究与前辈不同。昔日的繁华留下了一个令人神往却又永远只能想象的梦,而